

义的错误，但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央领导层，认为中央应该对官僚主义的盛行负责。这一批判为1965年以后他将官僚主义者称作“官僚主义者阶级”并力图摧毁僵化的官僚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1943年刘少奇积极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的时候，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树立毛个人的绝对权威，而是着眼于党组织的钢铁般的团结和领导权威的强化。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克里斯玛与民众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借助于民众对毛的崇拜来强化党的权威，这与毛泽东本人力图将自己与崇拜他的民众直接结合从而形成情念国家是不同的。在1956年4月赫鲁晓夫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刘少奇的意图进一步增强。具体说来，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的个人崇拜受到了否定，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的字眼。1958年4月，毛主动提出退出第一线、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一年后的1959年4月，经朱德的推荐，刘少奇成了国家主席。⁵⁴到1958年8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虽然对毛的个人崇拜仍在持续，但是党组织专制的基础得到了加强。

问题在于，从大跃进失败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开始，党对“三面红旗”路线所内含的根据地型国家或根据地型民族主义的反欧美式现代化的理念也进行了否定。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党的领导人在1962年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中，大力推进号称“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企业自主权，以及农业的“包产到户”）⁵⁵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这种做法与欧美现代化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明显是对根据地模式或共同体国家模式的否定。⁵⁶当然，毛泽东对刘邓的调整政策作出了强烈反应，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官僚组织予以彻底的破坏和打击。

从结果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的空间意识涵盖了国际社会的同时，在时间意识上也密切注意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时间加速化现象并试图与之对抗。结果到

人民公社时期，在实在空间方面依然坚持着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生命循环制约的根据地模式，同时将观念空间大幅度扩展，在时间意识上则面临着时间加速化的任务，也即如何大大压缩本来受到生命循环制约的时间。

与这一问题相关，我们有必要再次联想到竹内好所提出的欧美现代的“自我实现、自我扩张”决定了“东方”（亚细亚）的衰退乃至“失败”⁵⁷的问题。具体来看，通过空间上的扩张和时间上的加速化这两种外延性的力量，欧美的自我实现、自我扩张正是对东方的“囊括”过程。以等身大的空间和受自然生态系统缓慢的时间制约的根据地模式，必然导致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由于毛泽东抱有对欧美现代化模式“必胜”的信心，所以最终未能意识到它的失败。用竹内的话来说，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自觉意识到“失败”，所以忘记了“持续抵抗”。在人民公社遭遇挫折之后，毛泽东又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招致更大的失败，原因也在于这一点。

[IX]

毛泽东与刘邓：关于“失败的自觉”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招致的失败状况仍不被外界所知，直到大约20年后的1980年左右，超过2000万人死亡的惨剧才被披露。⁵⁸因此，竹内好直到进入晚年的70年代都并不明了上述情况。

如前所述，为了克服人民公社失败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领导下的党组织公然放弃了根据地模式，采取了接近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到1965年初，毛泽东开始明确地将这类官僚组织的领导人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而呼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⁵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

此拉开。这场运动正是毛泽东对于党的官僚组织进行全面攻击，试图将其彻底破坏的运动。他试图以此来重建将自身的克里斯玛权威与民众寻求救助的情念直接结合的情念国家，重新回到共同体国家模式。这与战前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形成过程中农本法西斯主义“皇道派”的意图相似。但毛泽东与皇道派的区别在于克里斯玛权威是否主动地打破官僚组织专制。天皇没有这样做，而毛泽东则选择了这种方式。

正如菅孝行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⁶⁰竹内好直到文革时期仍然高度评价和拥护毛泽东的中国。但问题在于竹内拥护的方式。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和评论，简直就像从宇宙飞船上俯瞰一样，令人感到主体的立场处于真空当中……丝毫没有对于日本所处的政治立场的考虑。这也是增加误解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革命是善的，而且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这一点来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与其说革命是突发性的事件，不如说与自己有着内在联系，无法与自己的日常性割裂开来。这样看来，革命就成了生存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我们（日本人）对于革命的印象，总是分裂成恐怖和憧憬两个极端。革命是……非日常性的，处于非日常性这一端。……我认为，如果忽略了这一差异，说是经过误解最终达到理解，恐怕是不可能的。”⁶¹

关于竹内好肯定并拥护毛泽东的中国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日本在战后全面追随美国，导致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仍在持续，长期难以讲和，而日本人对此缺少主体性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的要点在于：经过1960年的安保和60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日本在战后毫无反省地走上了比战前的“西化”还要西化的现代化道路。在竹内看来，陶醉于高速增长的日本人是一种“丧失了自我，啥都不是”的存在。因此，为了结束日中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日本人必须重新回到“回归自我”的道路，为此有必要对全面追随欧美式现代化的做法彻底反省。

第二，竹内认为，与中国人传统的“革命”观

相似，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根据地式的革命观指导下进行的，革命意识是以民众等身大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的。与此相对，日本人观念中的革命是非根据地型的，是建立在非日常性意识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一种超越了等身大的村落世界而飞翔到抽象的国家层面的意识。在竹内看来，人民公社运动是根据地型的非欧美现代化模式，是中国独自的现代化道路，继而是以“超现代”为指向的。竹内当初拥护文革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文革也是根据地模式的延续。

如果说竹内的上述认识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大致表现为两方面的疏忽，一是人民公社政策存在着欧美现代化的“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这一外部压力引起的空间和时间意识上的双重扭曲现象，二是由于毛泽东坚信可以赢得对于欧美现代的“胜利”，因此未能保持“持续抵抗”，也即“在自觉失败的同时，依然进行对失败的抵抗”。

但是，竹内如果完全遵循他已经提出的分析框架，是有可能避免这种认识缺陷的。实际上，那些与竹内的表现相反，在60到70年代批判中国的人，也绝没有认识到上述空间和时间上的扭曲以及“坚信胜利即是对失败缺少自觉”的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的重要性。

话说回来，作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无论是60年代前期刘邓主导的调整政策，还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提出的“改革开放”，面对持续进行自我实现、自我扩张的欧美现代的压力，虽然也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但却放弃了抵抗，主动卷入了欧美的“自我扩张”的潮流。这种做法与直到今天依然坚持“西化”道路的日本的“现代”并没有区别，都未能避免“自我丧失”。

概括起来说，对于欧美的现代，毛泽东的中国既缺少“失败”的自觉，也忘记了“挣扎”，邓小平的中国虽然有着失败的自觉，但却放弃了“挣扎”。在都缺少“挣扎”这一意义上，结果也就走上了丧失固有传统的道路。